

高等教育扶贫精准供给的问题、模式与路径

吕建强, 许艳丽

(天津大学, 天津 300354)

摘要: 贫困治理进入后扶贫时代, 扶贫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通过审视高等教育扶贫供给侧发现: 传统高等教育扶贫观难抑贫困再生, 离散化的高等教育扶贫制度消解了扶贫效果, 失衡的高等教育扶贫资源供给阻碍了扶贫效能发挥。优化高等教育扶贫供给模式既是教育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需要, 也是高等教育系统落实精准扶贫思想的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引、体系化的制度保障和差异化的资源供给是实现高等教育扶贫精准供给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高等教育扶贫; 供给侧改革; 精准供给; 贫困治理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614(2020)02-0017-05

联合国的经验表明, 教育在根治贫困方面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手段和重要方式^[1]。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减贫事业取得了重大成效, 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7年年末的3046万人, 累计减少6853万人; 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的10.2%降低到2017年年末的3.1%, 累计下降7.1%^[2]。高等教育扶贫在提高贫困人口科学文化素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我国整体治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精准扶贫的实质是从供给侧着手, 重组、优化各类扶贫要素, 提高扶贫供给成效, 构建科学合理的扶贫供给生态体系^[3], 以纾解贫困人口生存和发展困境。当前, 贫困治理已进入后扶贫时代, 扶贫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在进一步增强高等教育扶贫力度、不断满足贫困人口脱贫需求的同时, 需要优化配置教育扶贫要素, 增强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提高供给质量, 形成指导理念科学、制度保障完善、资源配置合理的高等教育扶贫精准供给模式与路径。

一、高等教育扶贫的精准供给问题表征

(一) 传统高等教育扶贫观难抑贫困再生

教育扶贫观决定了教育扶贫实践的方向和路径。受城市中心论和先赋性贫困理论影响, 传统的高等教育扶贫观过于强调致贫的外因, 没有将视野聚焦于贫困人口自身, 缺少对贫困人口的主体性关注。

1. “离农”教育扶贫观助长贫困

“离农”教育是以城市为中心, 培养离开三农, 进入城市主流文化而不是回归乡土的人才^[4]。英国经济学家巴洛夫在研究非洲问题时发现, 由于过分重视学术教育而忽视农业实践以及对农业人才的培养, 导致大量学生离开乡村去城镇谋生, 加速了非洲乡村的衰败和整体经济发展放缓^[5]。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21%以上, 其中, 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业人口仅占8.3%^[6]。而学校教育中的涉农专业却日渐萎缩, 教育部统计数据表明, 农林高校仅占高校总数的1.54%, 而且涉农专业学生数还不足农林高校总体学生数的15%; 职业院校扎堆开设汽修、计算机等非农专业, 涉农类专业更是一缩再缩。这种“离农”教育扶贫观下的教育实践造成农业人力资本质量大幅下降, 加之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以及人口市民化、老龄化等多重挤压效应, 使农村趋向空心化, 陷入“贫困→离农观→人才外流→空心化→贫困”的恶性循环。

2. “局外人”思想难以根治贫困

事物发展的原动力源于自身, 任何事物都内在地蕴含发展的胚芽。先赋性贫困理论范式认为, 由于能力、资源或潜力的匮乏, 贫困人口只有依赖外部支持, 才能摆脱贫困。这种忽略贫困人口主体性的思想, 致使贫困人口经常漂浮于扶贫工作之外而成为局外人^[7]。受生存环境影响, 贫困人口整体呈现出消极无为、固穷守旧、封闭保守的思想状态和行为, 逐渐构建出一种异于主流社会文化的亚文化系统, 这种文化系统又反作用于贫困人口, 进而形成“生活贫困→文化贫困

收稿日期: 2019-11-27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现代服务业高技能人才有效供给路径研究”(编号: TJJX16-002)。

作者简介: 吕建强,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职业技术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 许艳丽,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职业技术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

→能力贫困→生活贫困”的循环累积,最终呈现出自我维持、自我强化的贫困均衡^[8]。在一些地区,脱贫致富还未成为贫困人口的自觉行动,“等靠要”思想依然存在。因此,摆脱贫困首先要打破这种贫困均衡,摆脱贫困人口意识和思路上的贫困^[9],发挥教育对人精神和思想改造的根本作用,激发贫困群众的主体精神,才能根本解决贫困问题。

(二) 离散化的高等教育扶贫制度消解了扶贫效果

健全的高等教育扶贫制度是有效地推进教育实践的前提与保障。强同质化的制度设计、制度间耦合性不足以及评价监督的低制约性,没有显现制度合力,消解了教育扶贫的整体效果。

1. 制度设计的强同质化,遮蔽了高等教育扶贫的特殊性

贫困人口致贫因素复杂多元,相应的,减贫政策需求的异质性也非常强^[10],因此,高等教育扶贫受教育自身属性决定应显著区别于其他扶贫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教育部及各部委密集发布了多项扶贫制度,初步形成了扶贫总体框架。由于发布部门多元、时间密集、沟通协调不足等原因,使高等教育扶贫和其他扶贫制度、其他类型的教育扶贫制度之间呈现强同质化,突出表现在教育扶贫对象等同于一般国家贫困标准划分出来的贫困群体,致使一些因学致贫、因学返贫、留守儿童等被排除在教育扶贫政策视野之外。同时,高等教育扶贫制度与基础教育公平制度、基础教育质量保障相混淆,未能有效地发挥高等教育扶贫在解决贫困人口代际发展问题上的手段功能^[11]。

2. 制度体系的弱耦合性,消解了制度的协同效应

我国的贫困治理体系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扶贫工作机构和组织,但是由于过于强调既有的工作分属加之缺少实践上的统筹协调,极易形成条块分割、碎片化管理、协同性低的扶贫局面,造成教育扶贫资源配置不当、信息共享不畅。例如,2016年某省已完成建档立卡登记的大学生根据省教育厅相关规定向所在学校申请贫困补贴时,学校却依据本省10年前出台的文件拒绝给予贫困补贴。折射出一些地方在教育扶贫实践中,既缺乏政策的统筹规划,也没有及时与国家最新扶贫政策对标,教育扶贫制度之间协同效应不足,没有形成制度合力。

3. 评价监督的低制约性,降低了教育扶贫的实效性

有效制约的缺乏和评价监督机制的不足,成为制约教育扶贫实效的一大障碍^[12]。当前,教育扶贫主要由政府主导,政府既是扶贫理念的设计者,也是扶贫政策的实施者,甚至还是扶贫效果的监督者与评价者,这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制度设计很可能滋生权力滥用甚至腐败。审计署2017年年底对158个贫困县的扶贫审计结果表明,由于有效监督不足,有43个县的2.99万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农村低保子女等生活困难学生未能按规定享受国家助学金及寄宿生补贴等教育扶贫资助^[13];同时,由于过于依赖书面报

告,缺乏对扶贫状态的参与式评价,容易出现数据造假、只见数字不见成效等问题。

(三) 失衡的扶贫资源供给阻碍了扶贫效能发挥

教育扶贫资源供给应注意资源的优化和组合,过分关注单一经济救助和强调短期效应的教育扶贫资源供给模式,阻碍了教育扶贫效能发挥。

1. 资源供给类型失序,弱化了教育扶贫的基础性作用

通过教育手段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以摆脱贫困状态并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决定了教育扶贫的基础性作用。无论是文化贫困理论、资源要素理论,还是多维贫困理论都持有类似观点,即贫困的本质是源于文化封闭、资源短缺以及社会、政治权利缺失等造成的精神贫困、文化贫困以及能力贫困。激励双因素理论也认为,单纯的物质激励只能消除人们一时的不满,并不能起到持续的正面激励作用。因此,仅通过增加经济资源来试图根治贫困,而没有发挥教育对人这一根本主体的关注,很可能会诱发“福利依赖症”,出现以贫为荣的极端现象。

2. 资源供给周期失调,消解了教育扶贫的长效性

教育扶贫具有过程的长期性、效果的迟效性和价值的潜在性等特征^[14],因此,要特别注意防范过分注重短期扶贫效应,缺乏对教育扶贫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关注的倾向。在教育扶贫开发过程中,一些地方为了尽快取得扶贫效果,围绕能够凸显政绩的显性指标做文章,忽视教育自身规律与价值^[15],扶贫举措功利化明显,将“三支一扶”“三下乡”等教育扶贫实践与职务职称、评优评奖直接挂钩,有违教育扶贫初衷,使教育扶贫目标异化为参与扶贫人员获取自身利益的手段。

二、高等教育扶贫的精准供给模式设计

经济学认为需求侧包括投资、消费和出口“三要素”,供给侧则包含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新等要素^[16]。劳动力、土地、资本要素都可视为资源要素,因此,供给侧实质包含理念(创新)、制度、资源等三大要素。教育扶贫的理念、制度、资源构成了高等教育扶贫的供给侧,这三者分别决定了高等教育扶贫供给的定位、运转方式和实际成效,三者关系及运转形成了高等教育扶贫供给模式,并决定其效果和发展态势。通过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扶贫理念、体系化的制度保障、差异化的资源供给,构建相互协作、不断优化与持续供给的高等教育扶贫精准供给模式,逐步提高教育扶贫的实效性,不断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实现高等教育扶贫的“精准供给”(见下页图1)。

(一) 以人为本: 高等教育扶贫精准供给的理念指引

马克思说,“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7]。所以,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8]。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扶贫理念,将教育扶贫的实践方向聚焦于贫困群众的脱贫需求,重点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强化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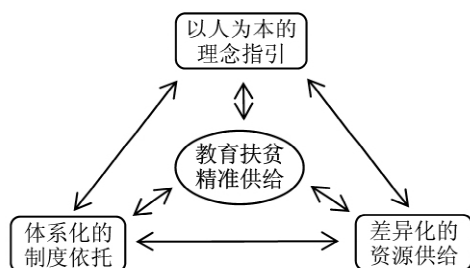


图1 高等教育扶贫的“精准供给”模式

1. 尊重贫困人口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贫困人口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也是脱贫致富的主体”。在扶贫实践中应尊重贫困人口的主体地位,畅通群众参与扶贫政策设计、扶贫资源配置的渠道,使其既成为教育扶贫的受益者,又能成为教育扶贫实践的参与者和设计者。同时,要充分激发贫困群体的创造性,只有在尊重贫困人口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将群众的聪明才智运用到教育扶贫实践中,激发其主体性意识和内生动力,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决心和意志,才能激发自身潜力,彻底摆脱贫困。

2. 以农业农村农民的脱贫需求为依归

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当前,我国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作为国家扶贫开发主战场的连片特困地区也都位于广大农村地区。在这一语境之下,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扶贫理念就是以农业农村农民的脱贫需求为本,针对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面临的特定困难,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们解决基本生计和长远发展的实际问题。

(二) 体系化: 高等教育扶贫精准供给的制度依托

体系化的制度保障是以整体视角,将离散的规章制度按照整体逻辑形成有序脉络,进而建构成体系。教育扶贫制度是教育扶贫供给模式的规则和运转机制,是教育扶贫理念的具体反映和教育扶贫资源供给的根本保障。体系化的制度保障应包含下述两个层面:

1. 协调统一的制度供给

所谓协调是指制度体系内部各因子之间没有矛盾冲突,避免由于矛盾对立消解制度效力,不利于整体制度的贯彻落实。统一性是制度得以体系化的前提和基础,意味着不同制度之间从形式到内容再到功能上的和谐一致,这是制度体系发挥最大功效的首要条件。在高等教育扶贫制度体系化的过程中,应遵循统一原则,使不同制度层级、不同制度类别之间协调统一,最终形成制度合力。

2. 边界清晰的制度供给

制度的边界意指制度的灰色地带,即制度执行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偏离制度初衷而造成制度漏洞。同时,一些教育扶贫制度表述过于含糊,给自由裁量留有空间,极易滋生腐败问题。教育扶贫制度边界的存在使有效监督难以精准实施,甚至执行效果也难以鉴别。因此,需要建立边界清晰的制度供给,尽量减少模糊地带,确保教育扶贫制度的形式和内容有明确指向,解释和执行有确切依据,避免不同制度之间交叉重叠,造成制度执行的混乱无序。

(三) 差异化: 高等教育扶贫精准供给的行动逻辑

教育扶贫实质是对贫困人口教育资源稀缺状态的二次干预,通过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弥补初始教育资源不足或初次分配不公。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和相对稀缺性决定了教育扶贫资源供给的重要性。差异化的教育扶贫资源供给是针对不同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分类型、有差别的教育资源,通过提高供给效率,保障不同贫困群体均能享有合乎需求的教育扶贫资源,实现扶贫效益最大化。

1. 教育扶贫资源供给的层次性

教育扶贫资源的供给本质属于公共服务供给,应基于当地经济社会条件、贫困人口教育需求差异,提供与现实脱贫需求相匹配的教育资源,避免出现扶贫供给与帮扶对象之间的供需脱节^[19]。在这一前提下,将精准满足贫困人口脱贫需求作为教育扶贫资源供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供给方式、层次、类型等方面有所差别都是可行的。

2. 教育扶贫资源供给的多元性

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教育资源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政府在教育资源的供给中既是制度的设计者也是资源的直接供给者,但不应是唯一供给者。而且,致贫原因的复杂多样性,必然导致教育扶贫资源需求的千差万别。基于此,政府独立承担教育扶贫资源供给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引入多方力量分担教育扶贫资源供给的压力,也为贫困人口获得各种异质性、多样化的教育资源提供了可能。

三、高等教育扶贫的精准供给实践路径

通过反思高等教育扶贫现状并结合高等教育扶贫精准供给模式的构建,提出高等教育扶贫的精准供给实践路径。通过理念引导、制度支持与资源配置,融合教育的发展功能,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促进贫困群体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一) 创新高等教育扶贫观,实现理念精准供给

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国家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创新高等教育扶贫观。

1. 树立兴农价值取向,提高农村人力资源质量

改变农村依附于城市的传统观念,将教育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融合,不断增强农村吸引力,在脱贫的同时,助力

城乡协调发展。在系统分析社情、民情、教情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探索高等教育扶贫新思路。建立区域和高校“双主体、二元共建共享”的育人新模式,通过定向招收、订单式培养具有本土特色的紧缺专业技术人才。精准的定向订单人才培养,确保学生“从哪里来、回哪里去”^[20],有效地提高贫困地区涉农人力资源质量,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2. 坚持内生性教育扶贫观,开展参与式扶贫

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愿望和内生动力直接决定了脱贫攻坚的最终成效。改变过去政府主导贫困人口被动接受的外源性教育扶贫模式,在对贫困人口文化和心理研究的基础上,改进扶贫宣传教育方式,重点引导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思想,调动贫困人口的摆脱贫困的积极性,强化自我脱贫意识,使其成为贫困治理的主体,将局外人转化为局内人;再因地制宜地传授脱贫知识和技能,提高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探索“院校+企业+农户”的协同教育扶贫模式,通过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针对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研发教育扶贫开发手册,因地因户因人制订脱贫方案。借助高校科研文化优势,向贫困人口传授基本文化知识和思想培育,强化其脱贫意愿和动力;利用企业市场技术优势,结合当地产业特色,开阔贫困人口的视野和增强市场经济意识,通过提供实用技术和技能培训,培育其脱贫致富能力。

(二) 加强制度创新与联动,实现制度精准供给

加强高等教育精准扶贫治理并构建动态的长效监督评价机制,对促进教育扶贫的精准落实与提升扶贫效能意义重大^[21]。通过差异化的制度设计和构建多元化的治理格局以及多维评价监督体系,强化高等教育扶贫制度保障能力。

1. 差别化设计高等教育扶贫制度

一是有效识别教育维度与其他维度涵盖的扶贫对象。在提高教育质量和改善教育公平的政策前提下,结合教育自身属性与改革发展需求,融入国家教育扶贫目标,避免将教育扶贫目标与国家扶贫目标简单对接。除了边远地区的贫困学生以外,城市贫困家庭子女、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也应纳入教育扶贫政策的覆盖范围。二是有效地区分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教育质量保障。针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类群体分别进行制度设计。针对前者,应定位于提高其知识和技能水平,进而增强其自我生存能力,提高其生活质量;重点关注后者的发展性需求,以提高其代际上升和发展机会。

2. 构建大教育扶贫格局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教育扶贫体系,进一步规范教育扶贫参与主体的权责利,形成多元高效的教育扶贫治理格局。在社会整体层面,采取政策取向多元化策略,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贫困群体的意见,使教育扶贫政策更具代表性和普适性,为教育扶贫制度制定达成理念共识;在教育系统内部,整合教育信息,打通信息孤岛,建设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实现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提升数据信息的一致性

和准确性,有效地增强各级各类教育扶贫制度间的协同与衔接。

3. 建立多维评价监督体系

一是建立健全自我评价机制。针对教育扶贫项目进展和成效实行逐级考核评估,通过专项责任审计和终身责任制,强化问责机制和责任共担机制,有效地杜绝教育扶贫中的不作为、乱作为甚至贪腐行为。二是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采用专项调查、抽样调查与实地核查等多元评价策略,对教育扶贫对象的识别和退出、群众满意度、帮扶成效等指标进行独立评估。三是借助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最新技术完善评价链条。从教育扶贫对象精准认定、教育扶贫需求精准识别,到教育扶贫资源精准供给,再到教育扶贫效果精准诊断,实施全流程监督评价,形成完整闭合的评价链条。

(三) 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源精准供给

通过资源供给类型和供给方式的组合优化,构建差异化教育资源供给模式并强化教育资源供给的长效性,提升教育扶贫资源供给水平与供给能力,实现教育扶贫资源的“精准供给”。

1. 构建差异化的教育资源供给路径

以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贫困群体陷入贫困的原因不仅是收入低下和物质贫乏,还表现为收入、健康、文化、教育、权利等多种可行能力的不足^[22]。应从多维视角对贫困问题加以审视,然后根据具体致贫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扶贫资源供给。一方面,各类教育资源投入向贫困地区倾斜,破解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地域之间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差距过大引发的“扶教育之贫”的问题;另一方面,借助教育的补偿和发展功能,提升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提高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实现“依靠教育扶贫”的目的。在具体教育扶贫机制上,探索从单一的教育拨款,逐步向政策引导、建立机制、搭建平台等多元化的教育扶贫长效机制构建过渡^[23];在具体策略选择上,探索直接财政补贴、转移支付、以奖代补、以工代赈等教育扶贫方式的多策略组合,激发各扶贫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 改良教育资源供给的长效性机制

在教育扶贫实践中,应以教育自身规律与价值为前提,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结合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提供教育资源支持,强化教育资源的持续性供给。一是拓宽教育扶贫资源渠道。通过整合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教育资源,充分发挥教育扶贫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提高教育脱贫能力和拓展教育扶贫施展空间;同时,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扶贫开发,并创新社会扶贫参与方式^[24],使教育资源供给主体多元化,凝聚形成教育扶贫合力,减轻政府作为单一供给主体的压力和不足。二是建立教育扶贫资源动态调整机制。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将教育资源供给与扶贫

动态相结合,根据教育扶贫各阶段目标实现程度来调节教育资源投入和使用,保证教育资源供给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 财富蕴藏其中: 第2版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 166.
- [2]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Z]. 2018-02-28.
- [3] 叶善青. 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J].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2): 181.
- [4] 张济洲. “离农”? “为农”? ——农村教育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6(3): 11.
- [5] Foster P. The Vocational School Fallacy Revisited: Education, Aspiration and Work in Ghana 1959-2000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02(1): 27.
- [6] 国家统计局.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5号 [Z]. 2017-12-16.
- [7] 秦清芝. 影响农村扶贫工作社会效益模式探究 [J]. 东岳论丛, 2013(10): 122.
- [8] 彭晓红.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立论依据、困境与出路 [J]. 教育与职业, 2017(24): 16.
- [9] 习近平. 摆脱贫困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172.
- [10] 陆汉文, 黄承伟. 中国精准扶贫发展报告(2017)——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57.
- [11] 司树杰, 王文静, 李兴洲. 中国教育扶贫报告(2016)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98.
- [12] [14] 代蕊华, 于 璇. 教育精准扶贫: 困境与治理路径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7(7): 11, 10.
- [13] 审计署. 2017 年第 6 号公告: 158 个贫困县扶贫审计结果 [Z]. 2017-06-23.
- [15] 杜学元. 从教育属性看教育扶贫工作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7(12): 3.
- [16] 冯志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J]. 经济问题, 2016(2): 15.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118.
- [18]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N]. 人民日报, 2017-10-28(1).
- [19] 冷志明, 茹 楠, 丁建军. 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研究 [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2): 75.
- [20] 马济民, 王 迪, 黄德刚. 试论我国民族地区涉农紧缺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以甘孜州“定向订单”人才培养模式为例 [J]. 民族教育研究, 2016(4): 97.
- [21] 朱德全, 吴 虑, 朱晨成.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逻辑框架——基于农民工城镇化的视角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1): 75.
- [22] [印]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 [M]. 任 贻, 于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85.
- [23] 吴 霓, 王学男. 教育扶贫政策体系的政策研究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7(3): 82.
- [24]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 [Z]. 2014-11-19.

Problems, Models and Paths: Precise Suppl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by Higher Education

LV Jian-qiang, XU Yan-li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4, China)

Abstract: Poverty management has entered the post-poverty-alleviation era,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upply-side refor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Through inspecting the status of higher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supply, it's 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higher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s difficult to block the regeneration of poverty fundamentally, the imperfect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can't consolidate the effec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imbalance in higher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 hinders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full effectiveness. Optimizing the “accurate supply” model for higher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not only the need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 but also the embodimen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implementation on the idea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us, the effective path to realize accurate supply of higher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can be summed up into three points, namely, human-oriented idea introduction, systematic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differentiated resource supply.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supply-side reform; accurate supply; poverty governance